

繼承、創建與深化——

劉翔*

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七大陸隋唐佛學研究述評（二）

二、有明顯個性特色的佛教學者開始
創建自身的佛學思想體系，產生
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研究成
果。¹

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繼承任繼愈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路向，並在全面性、體系性和深刻性上有所推進。² 一是對中國佛教思想發展演變的過程作全面追蹤和具體描述，指出其基本線索，解答佛教「中國化」中出現的各種疑難問題；二是通過對佛教諸多概念、範疇和命題的揭示、辨析，指出它們如何對儒、道思想產生深遠影響，提供佛教思想方面的各類研究資料，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和思路。更為可貴地，作者在深入探討具有思辨色彩和形上意義的佛教哲學思想同時，以批判的精神，對佛教思想演變過程的世俗化和庸俗化進行了剖析，對其中的得失進行了思考和反省。

為了展示隋唐佛學思想以哲學思辨見長的形上學特

徵，《史稿》第二卷詳盡分析了佛教學派和宗派的概念、範疇、命題，描述了它們的發展演變過程，揭示了其體現的文化內涵、思維特徵、知識取向，以及對傳統哲學思維的影響、與哲學史進程的相關關係。特別對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化」佛教思想，較多闡述了它們與傳統思想的相互關係。《史稿》十分重視歷史上湧現的佛學大師，對諸如智者、玄奘、宗密等佛學巨匠的思想和著作都有細緻的分析和論述，肯定高僧所具有獨立品格和豐富學識的人格意義。作者認為，程朱理學之前佛教的理論思想和價值觀念對於漢民族思維習慣的影響以及對傳統思想和學術形態的演進，是持久而深刻的。若沒有或缺乏佛學的基礎知識訓練和總體精神把握，則難以深化中國古代哲學的現代研究。

為此，作者以針對外部世界的反智論系統和關於內心世界的心性論系統兩條線索展開討論。通過研究作者指出，反智論在特定歷史環境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

義，也能引發傳統知識份子的思想激情，但是總體上，超越性「智慧」折射的是農業文明下的經驗性思維成果，它消解了對外部世界持之以恆的探索熱情，也妨礙了對現實社會人生作出根源性理論批判。如，作者一方面積極注意到禪宗的直覺思維表達的思想史意義，同時也注意到其反智論帶來的流弊，「禪宗繼承反智論直覺思維系統，在間接展開社會批判的同時，將深刻的哲學理論思維化為當下的思想片段。」³關於心性論系統，作者把「一心二門」視為一元性思維的核心表達，這種思維方式決定了「復性」學說的形成，而復性學說幾乎貫穿著《起信論》以後的全部古代哲學思想史。作者認為，自《起信論》成立起，儒釋道三家普遍轉向心性的討論，這嚴重妨礙了二元化主客體對待的認識思路，從而使中世紀的民族思維停止於簡單樸素的形態，難以進入近代科學思維階段。

總之，《史稿》不僅是佛學研究領域的重大成果，也提供了學術典範，立論有全面性、系統性以及獨創性等鮮明特點，資料廣博而詳實，內容周全而厚重，述論嚴密而深刻，具有很高的理論水準和學術價值。

而這一時期隋唐佛學研究最具創新意義，當數夏金華《隋唐佛學研究》，無論是思想內容和研究方法，可

謂大陸隋唐佛學義理研究的新典範，代表了該領域研究的前沿水準。⁴全書以緣起論、佛性論、修行成佛的方法與途徑（或稱之為「修行成佛論」）「三種理論」，來把握與論述隋唐佛學，對宗派之間的思想互動、交融作了深入細緻的分析，對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結論予以訂正；對若干學界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與評價，視野開闊，識見獨特。

作者認為，隋唐時期雖然宗派眾多，義理繁雜，基本是圍繞著緣起論、佛性論與成佛的方法與途徑三方面的理論展開的。這是隋唐佛學的精要所在，特色非常鮮明。對照佛教戒定慧三學、信解行證之說，無論是印度佛學還是本土佛學，對於「三種理論」均多有討論，只是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側重而增益或減損而已。相對來說，隋唐時期「三種理論」研究的內容更為豐滿而完整，以「三種理論」為線索研究隋唐佛學，既提綱契領，又不離佛教本源和宗旨，且與前後理論發展（漢魏晉南北朝與宋明佛學）相呼應。

「三種理論」的提煉，既有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又與學界流行的與西方哲學掛鉤的研究趨勢不同，且不局限於中國哲學史意義上的宗派思想分析，也和印順法師提倡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方法不一樣

。在學術界是沒有先例的，自成一格。在看似承襲舊貫的論述中，從橫向的角度切入，體現各個宗派思想之間的相互交涉、交流和交鋒的真實面貌。

內容上，該著對學術界關注和爭論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論證有力，多有創見。比如，分析隋唐佛學系統的形成與發展主要得力於四個方面：一、六朝佛學連續的興旺成為隋唐佛學豐富和發展的基礎。佛教東漢傳入，經過魏晉南北朝五百餘年的吸收、磨合與積累，學派的相繼出現，至隋唐時形成佛學宗派的全盛時期，猶如水到渠成；二、隋唐時期第一流人才投入佛門，是佛學持續興旺的有效保證。隋唐佛學之興，人才是其根本。作者特別搜羅儒、釋、道三家的傳記資料——《儒林傳》、《高僧傳》、高道傳記等，分類統計，列成表格，展示出隋唐時代儒、釋、道三家人才的概貌，清晰明瞭；三、宗派之間及內部爭論與融合，是促成隋唐佛學朝著博大精深、幽玄細密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隋唐佛學中最為成功的發展是佛學理論的融合創新，也就是形成本土佛學自身特色的重要標誌；四、外部因緣，即時代的要求、帝王的支持和寺院經濟的發達，也同樣重要。

此外，對於天臺宗的「一念三千」、「性惡說」、「無情有性」，以及法相宗的「唯識無境」，禪宗的「

頓漸之爭」等重要學術問題，均有細密闡述，並提出一家之言。

該著繼承呂澂一系注重經論依據的傳統，可謂之「佛教經學」，語出有源，論證有據，解決了隋唐佛學的諸多問題。同時，注重佛學的宗教特徵，不以純粹哲學分析的立場對佛學思想進行判釋，史論結合，評析公允。而且充分吸收國內外學界和教界研究成果，注意到佛學完全學術化、方法化的弊端，關注佛學思想的實踐意義。

（未完待續）

註釋：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生；通信地址：上海市閔行區東川路五〇〇號（二〇〇二四一）。

1. 對中國佛教有體系建構的典範性人物，在佛教哲學領域當推已故方立天教授。十卷本《方立天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反映了其半個世紀以來學術探索。在內容上，其主要從五個方面展開：中國佛教思想家的個案研究、中國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學的現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國化探索、中國佛教哲學思想體系的構築。中國佛教哲學的研究，以方氏貢獻為最，其結合現代哲學發展要求，篩選、歸

結中國佛教的重大哲學問題，構築中國佛教哲學的思想體系；運用現代語言，詮釋中國佛教哲學的概念、範疇；尋究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原來意義；體會中國佛教某些哲學語言的言外之意；探索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發展規律；總結中國佛教哲學理論思維成果；進行比較研究，以把握中國佛教哲學的思想特色；闡發中國佛教哲學的現代價值和意義。佛教中國化的研究方面，方氏秉持「中國本位」的立場，認為中國人是以先前本國文化結構去理解佛教，是以中國人的實際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對待佛教，是以中國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總結中國佛教有六個重要特點：重自性、重現實、重禪修、重頓悟、重簡易、重圓融。在方法上，方氏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結合現代西方哲學和宗教學理論，闡述和詮釋中國佛教和中國哲學的概念、思想和精神，是哲學和哲學史的相結合，為中國佛教與中國哲學的現代解讀、科學研究與傳播發展提供了新的範式。方氏思想體系在二〇〇六年六卷本文集中已經得到體現，因故，在這一時期隋唐佛學的研究創新上，未有單獨列為一家。

2. 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3. 《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第一卷，作者的話，八。
4. 夏金華：《隋唐佛學研究》，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二〇一三。

5. 作者指出「西方哲學的分類標準，從整體上未必適合中國哲學或佛學，……我們並不否認在某些具體的思維方法或表達論述上有似或相近的地方，存在溝通和比較的可能性，但並不意味著在整體上達到二者相互契合的程度。」為此，作者比較了西方哲學和佛學的三大相異之處：最終目的的追求、實際操作的手段、永恆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係，認為「在西方哲學與佛學之間尚未達到能在整個思想層面上基本認同的程度。」而在永恆世界與現實世界關係上，西方哲學與佛學的分歧更大。對於臺灣印順法師提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論，在佛教界乃至學術界影響頗大，作者在肯定其方法和研究的重要價值的同時，也表示「不全面認同」，對個別問題仍是提出商榷之處。（參見《隋唐佛學研究》）

智慧法語

藥能治病，不能治命。